第二章

中央圖書館的創建與管理

蔣中正爲重慶興建的中央圖書館題款。

民國二十二年，蔣復璁在南京成賢街創辦的中央圖書館。

民國三十年在重慶時，蔣復璁 (中) 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同仁合影 (右一爲屈萬里先生)。

重慶兩浮支路口的中央圖書館館廈，抗日戰爭中期以中英庚款建成。

筆路藍縷，籌創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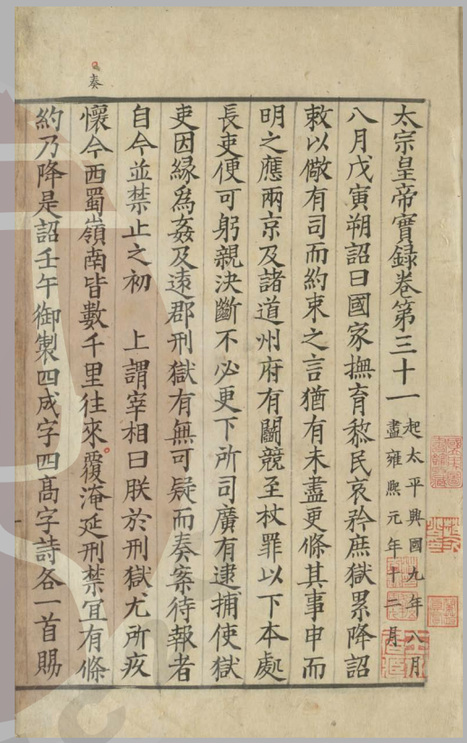
在朱家驊、王世杰先生的支持下，父親於民國二十二年創辦國民政府的中央圖書館（今南京圖書館），歷任館長三十餘年，一生在南京成賢街、重慶兩浮支路、臺北南海路建造了三座標準館廈，並請蔣中正題款「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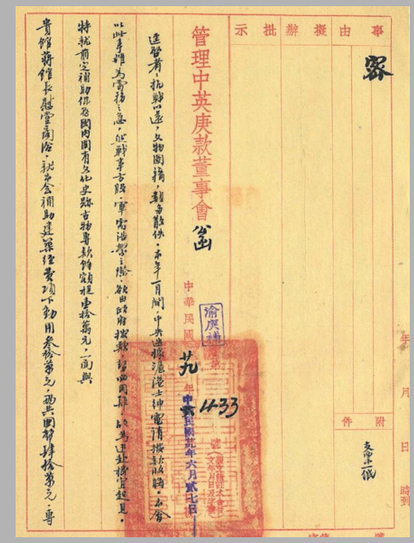
辦館的意義有三點：一為集藏全國文獻，二為購備各國重要典籍，三為建設全國示範的圖書館；且在北大恩師胡適的指點下，收集歷代「官書」建立檔案庫，又搜購秘笈孤本及珍稀的佛經、敦煌寫經，收藏居延漢簡三十枚、甲骨文若干片，使中央圖書館有了古代的文書古物，另外還附建一座印刷廠（在南京淪陷時遭日軍搶占破壞殆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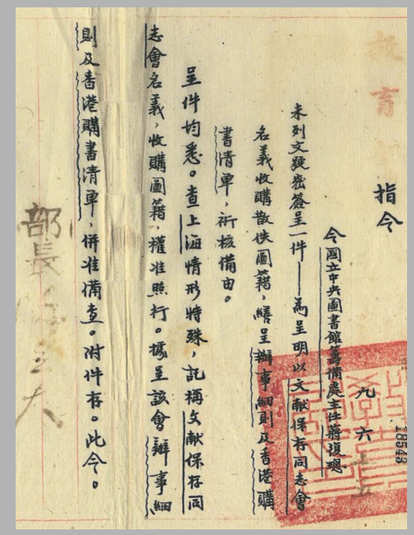
中央圖書館籌創之初，教育部撥交遜清學、禮兩部圖書館檔案（四萬六千餘冊）及國學書局印刷設備，作為發展基礎。當時籌備處並無固定預算，人員經費均感不足，幸而北大老師朱家驊先生此時兼長教育、交通二部，暫由交通部按月輔助兩千元支應一切。直至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始核發正式預算，推展各項業務。在此艱困環境下，父親一本振興圖書館事業、傳揚中華文化之初衷，以自力更生之精神謀求發展。籌備期間，為奠定中央圖書館未來發展基礎，實施以下舉措：

一、接辦「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促進交流文化

出版品國際交換制度始於一八八六年，各國於比利時訂定的一項國際協定。內容為：各國約定於國家內設立交換中心，推動出版品國際交換事宜，以促進文化交流。民國十四年，該中心劃歸中


〈宋太宗皇帝實錄〉。（中央圖書館提供）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密函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中央圖書館提供）


教育部密令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中央圖書館提供）

央研究院辦理，更名為「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成立，由父親接洽，並獲中央研究院及教育部同意，交換處移由中央圖書館接管其業務。七十餘年以來，中央圖書館與一百三十餘個國家建立出版品交換關係，對等交換各國書刊，對於館藏之發展大有裨益。

二、修訂《出版法》，蒐集全國圖書文獻

民國二十四年，國民政府行政院召開《出版法》審查會，父親代表出席，力主在《出版法》中增列，若有圖書出版，須送繳中央圖書館一冊，俾國家圖書館得以完整典藏全國出版品，有益於文化之保存與傳承，該建議獲得各方支持並通過。《出版法》屢次修正呈繳制度，以配合國家圖書館之發展，亦作為編輯國家書目的依據，早在七十年前父親就已有此遠見，令人敬佩。

三、影印《四庫全書》，發揚中華文化

《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書之一，也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叢書。在清乾隆時編纂，始於一七七二年，經十年編成，共收錄古籍三千五百〇四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卷，裝訂成三萬六千餘冊。「四庫」之名，源於初唐，初唐官方藏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個書庫，號稱「四部庫書」，或「四庫之書」。經、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圖書分類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圖書，故稱「全書」。

《四庫全書》的纂修，由乾隆帝欽定最信任的大臣紀曉嵐全權負責，始事於清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至四十七年編校竣工。計收書三千四百六十萬種，凡七萬九千餘卷，裝為三萬六千餘冊，集我國古代著作於一編，實為空前之巨制，東亞學術文化之寶藏。其書先後抄善七部，分置南北各地。儲藏熱河行宮（今北戴河避暑山莊）曰文津閣，儲於故宮博物院者曰文淵閣，儲於圓明園者曰文源閣，儲於盛京瀋陽者曰文溯閣，合成北四閣；置於揚州者曰文匯閣，置於鎮江者曰文宗閣，置於杭州者曰文瀾閣，號稱南三閣。其中之文匯、文宗二閣書，毀於洪楊之亂（太平天國），文瀾閣亦佚逾半，文源閣書則悉燼於英法聯軍入侵之役，僅完者，惟文淵、文溯、文津三閣而已。姑無論清高宗賜令纂修《四庫全書》之動機如何，四庫之內容實為中國文化精英集成，為學者所推崇。

民國二十二年，父親接掌中央圖書館籌備處，適文淵閣四庫全書移存上海，乃建議政府選擇其中珍本影印，以弘揚中華文化，並可利用版稅贈書和國外交換，充實館藏。本案經行政院通過，並延聘目錄學者襄助選目，由商務印書館進行攝印，共選印二百三十一種，計兩千冊，皆流傳稀少者，書名為《四庫全書珍本初集》。自民國八年以來，影印四庫之議，共有六次皆以卷帙浩繁、所費昂貴而未成事實，而在父親主持推動下，第七次得告實現。在臺灣，四庫珍本賡續印行，共出版十五集，得書一千八百七十二種，一萬五千八百三十二冊，已逾全書之半。民國五十四年，父親出掌故宮博物院，曾提報故宮常會，通過後，續交商務印書館影印藏文淵閣四庫全書，以竟全功。

四、集藏方志、官書

中國歷史悠久、國土廣大，各地區的地方誌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如清朝即修過三次《大清一統志》。梁啟超先生特別重視，並稱頌近代的章學誠先生為地方誌的奠基者，故中央圖

書館自建立時起，一直大力收集。目前兩岸圖書館皆有豐富的地方誌收藏，而外國也因欲瞭解中國等各種原因，在侵華的過程中曾廣為收集或派人前來大量收購。我國方志流散在世界各國的數量驚人，估計幾乎有一半流落於海外。此外，政府的出版品、各部的公報等稱「官書」，也是很有價值的文獻，故持之以恆地盡力收藏。

冒險犯難，搶救江南古籍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而江南地區數百年來為我國人文淵藪。就圖書而言，《四庫全書》的南三閣：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杭州的文瀾閣，皆在江南一帶；明清著名的藏家，也大都集中在蘇浙皖等江南數省境內。然而自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日軍侵華，江南一帶不少古籍善本毀於戰火。即便能倖免於難，卻也因出於逃難或生活困難，有意求售維生，於是文獻古籍不斷流入上海市場，而引起日本、偽滿、美國等各方面注意，派人大量收購，企圖將善本席捲而去。

父親時任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自抗戰爆發中央圖書館遷往重慶後，即不斷接獲淪陷區許多文化界的愛國人士報告，著名的藏書樓，如寧波天一閣（明清範欽所創建），吳興嘉業堂（民國九年劉承幹於湖州南潯所創建）、江寧鄧氏群碧樓、玉海樓（西元一八八八年瑞安城關鎮孫依言、孫治讓父子所創建）等均遭日本、美商覬覦，妄圖破壞，強行收購圖書；同時文化界愛國人士也痛陳江南珍貴文獻遭劫的嚴重後果，建議政府撥款積極搶救這批中華瑰寶。父親想到這些古籍面臨散失和流落異邦的險境，感到焦急萬分，隨即在重慶向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中英庚款會董事長，恩師朱家驊先生匯報，尋求支持。

朱家驊先生對父親說：「中英庚款會還存有支持中央圖書館在南京建築館廈的一百五十萬國幣，現在抗戰爆發，除了可在重慶先建分館外，不如將這筆錢先拿出來，趕快在上海收購江南民間散出來的珍貴文獻圖書，以免物價飛漲下貨幣貶值，同時可為中央圖書館的藏書打好基礎，一舉兩得。」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對此也極為贊成，所以待庚款用盡後，父親排除萬難，行政院獲准通過，分批撥款支應，繼續搶救收購。

因為經費有了著落，故父親奉命於民國二十九年一月於重慶出發，計畫由香港秘密潛返淪陷區上海。不料抵達香港後，被日本特務盯住，以安全角度而言，他可立刻終止計畫返回重慶，但他認為戰時公務員如同戰士，應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倘若因此犧牲性命，也是光榮的，所以他仍不顧個人安危，繼續前往上海。幸獲國民黨駐港負責人高延梓相助，預先購好船票，於某日淩晨上船時，機智地擺脫了跟蹤，神不知鬼不覺地登上開往上海的義大利郵輪。

在香港期間，父親除了和中英庚子賠款董事會董事葉恭綽先生面商搶救收購古籍善本外，還特地去探望了母校北大的老校長蔡元培，並向他匯報了這項重任，蒙其支持讚許。關於此事，蔡元培日記有所記載：

「午前，仲瑜和蔣慰堂復瑗來，慰堂在中央圖書館服務甚久，現在渝仍積極進行，此行由港往滬，擬收賣舊本書，在港託葉玉甫，在滬託張菊生，閩瞿氏鐵琴銅劍樓、鄧氏群碧樓之書均將出售。」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七日）

兩個月後，蔡元培校長病故香港，使得這次會面猶如生死永別。父親感慨地說：「蔡先生是中國文化教育界的泰斗，他的一生和中華文化的發揚是分不開的。」

父親抵達上海後，化名蔣明叔，拜訪了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先生，並會同「文獻保存同志會」（由鄭振鐸等文化界愛國人士組成）的諸位同志密商各項重要事宜。大家團結合作，明確分工後，決定由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伯丞）負責經費收支；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詠霓）負責版本與價格的審定；考古作家鄭振鐸（西諦）負責與書商及藏書家接洽，並兼圖書保管與編目；中法大學教授張鳳舉分管採訪等具體事宜；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菊生）負責文獻古籍的總鑑定；葉恭綽（譽虎）負責廣東香港方面的收購，及主持由上海寄往香港精品古籍的轉運事宜；父親則坐鎮重慶擔任總指揮，與國民政府等相關部門協調，和香港、上海書信往來，密電聯絡。

關於這段往事，鄭振鐸先生在日記中作了詳細記錄：

「上午十一時許，柏丞先生來。說起蔣復璁來此，係為了我們上次去電，建議搶救、保存民族文獻事，教部已有決心，想即在滬收購，以圖挽救。擬推舉菊生先生主持其事，惟他力辭不就，已轉推張詠霓先生。此事必當進行，惟亦須萬分機密，且必須萬分謹慎，免得將來有人說話。我不想實際參與其事，但可竭力相助。當與柏丞先生約定，在後天中午，與蔣、張諸位在菊生先生宅商談此事。」（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四日）

「八時許，到校辦公，清理積牘，晤柏丞先生，談及購書事。已決定由菊生、詠霓、柏丞、鳳舉四位及我負責。下午回家一行，檢出幾部需用之書攜帶在身邊。至中國書店，晤姚石子先生，談甚暢。傍晚，至萬宜坊蔣宅，訪蔣復璁先生。我們第一次見面，但暢所欲言，由如老友。他說起這次戰事中中央圖書館的損失，說起內地購書的困難，說起將來恢復的計畫；說起內地諸人要他來此一行的原因，然後談到我們的去電。余則談起江南各藏書家損失的情形，談起平賈們南來搶購圖書的情形；談至玉海堂劉氏，和學齋徐氏藏書散失的經過；然後說道我們發電的原因和我們購書計畫。最後說到我個人在劫中所得的東西，說到某某書、某某書失去了可惜。我們談到九時許，竟忘記了吃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六日）

「正午，與柏丞同赴張宅。慰堂、鳳舉二位亦到。談甚久。原則上以收購藏書家之書為主。未出者，擬勸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則擬收購之，絕不聽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國外。玉海堂、群碧樓兩家，當現行收下。我極力主張，在陰曆年內必須有一筆款匯到，否則劉、鄭二家書將不能得到。又主張，購書絕不能拘於一格，絕不能羅致大藏書家所藏為限。以市上零星所見之書，也盡有孤本、善本，非保存不可者在。不能顧此失彼。必須仿黃堯圃諸藏家的辦法，多端收書。但他們的意見，總以注意大批的收藏為主。最後一致同意，自今以後，江南文獻，絕不能聽任其流落他去。有好書，有值得保存之書，我們必須為國家保留之。此願蓄之已久，今日乃得實現，殊慰！鳳舉與余，負責採訪；菊生負責鑑定宋元善本，柏丞、詠霓則負責保管經費。」（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九日）

為了躲避日軍的追蹤，父親在上海期間的活動是十分隱密的，許多事情必須借助家人的力量，如我舅父孫平沙及表舅父吳厚章（著名的眼科專家，民國三十八年後曾任上海市眼病防治所所長）出面購買從上海到香港的義大利郵輪船票，並開車上輪船碼頭掩護接送；我的伯母朱維瑰也多次代

其出訪，進行交通聯絡。

當父親確定了可靠的收購計畫後，已臨近民國二十九年的農曆春節，此時伯母和母親帶著我們子女住在上海萬宜坊（今重慶南路鄒韜奮紀念館弄內），但父親認為國事重於一切，遂放棄與我們共享天倫之樂，立即趕回重慶覆命去了。他走後不到三天，汪偽特務、日本憲兵隊就以查戶口為名找上門來，幸虧當時已先走一步，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這次古籍收購行動由國民政府教育部出資，中英庚款會撥出大量補助款，加起來近三百萬法幣左右，經由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先生設法經香港的銀行轉匯上海。這是在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組織規模最大的一次搶救圖書工作，收穫也是最大的，在江南一帶收購了八批，北方一批，廣東方面三批古籍。從民國二十九年四月開始，到民國三十年年六月止，一共收購到江寧鄧氏群碧樓、嘉興沈氏海日樓、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天一閣海原閣舊樓、盧江劉氏遠碧樓、順德李氏秦華樓、劉氏風雨樓、吳興劉氏嘉業堂與張氏適園張蔥玉善本一百多種，以及杭州胡氏、武進黃氏、番禺沈氏、聊城楊氏海源閣、吳縣潘氏滂喜齋、江安傅氏雙鑑樓的藏書；還從張元濟處購得唐宋寫本、刊本精品五種、宋刊春秋經傳集解等六種；鄭振鐸處的明史圖錄、香港寶禮堂宋元本書目等等，計善本四千八百六十四部，四萬八千多冊。鄭振鐸還從珍貴古籍中選取最精品八十二部，於滬港轉運至重慶，由抗戰時中央圖書館特藏組主任屈萬里點收。重慶中央圖書館曾選若干孤本影印發行《玄覽堂叢書》，先後出版三集，皆為當代重要史料。

當時這批國寶古籍一部分藏匿於上海的佛寺，因運費高昂，僅少部分運往重慶，大部分運往香港，寄存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為方便認別，加蓋了中央圖書館館章。父親通報北大老師胡適（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相助，已談妥擬暫時運往美國國會圖書館存放，不料尚未啟運，即在民國三十年冬爆發了太平洋戰爭，香港淪陷，這批國寶被日軍搶劫，運去了東京。

抗戰勝利後，顧毓琇先生訪日接收科技事項時，無意間在日本東京的帝國圖書館倉庫中發現這批書，後經我國駐日軍事代表團深入查證，幸有中央圖書館館章為憑，這批寶書才失而復得。當年香港淪陷後，馮平山圖書館陳君葆館長除了不卑不懼地和日軍周旋外，也曾將這批國寶中的一小部分藏匿了下來，待抗戰勝利後歸還給中央圖書館。為此，馮平山圖書館檔案中還保存著父親致陳君葆館長的兩封親筆感謝信。

民國三十七年冬，中央圖書館奉命將這批古籍善本，隨故宮文物一起運送到臺灣，連同原來館藏珍本共十四萬冊善本，現均安然無恙地保存在臺灣的「國家圖書館」，開放給海內外的讀者，藉此傳揚中華文化的獨特之美。